

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嶺南大學



屯門·香港

族群研究論叢 2

2000年1月

嶺南大學首先獲得香港崇正總會慷慨撥捐經費，於1998年開設了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計劃。作為一嚴肅的學術題目，族群和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領域，亦為中國研究提供了一新的方向和路徑。本計劃的主要目標為拓展華人研究範圍，以及提高世界各地對種族認識及華人商業研究的興趣。

『社會經濟變遷與客家人的教育』

王 東

際百科全書》在總結客家人的特點時，也有着這樣的結論：“客家是中華民族中最優秀的民族之一，教育普及，在全國中為最。”¹ 其實，西方傳教士和人類學者眼中客家地區的學校教育盛況，只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客家地區的學校教育，與經濟文化發達的其它地區相比，還是相當落後的。追溯客家地區學校教育發展的歷史進程，我們發現客家地區學校教育的發展和普及，與明清以來贛閩粵客家社區的社會經濟變遷具有內在的聯性。換句話說，客家社區的社會經濟變遷，是客家校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因。

客家地區學校教育的歷史回顧

說到客家人的教育，不少研究者總是從所謂“衣冠南渡”入手。在他們的心目中，客家地區教育的發達不僅由來有自，而且有其血統上的自由²：

客家人的遠祖多是中原大族世家，即從魏晉以來形成的“衣冠望族”。這些衣冠望族在六朝以後，雖被迫輾轉遷入嶺南定居，但那種威嚴和氣派並未被逃亡生活所折磨殆盡。每個家族在逃亡中都是一個集體，完整地保留着中原衣冠望族的文化意識和封建宗法意識。這些正是漢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粹，即正統觀念，保守的、固執的祖宗之法的道德價值，以及出身高貴、書香世家或詩書傳家的文化教養而產生的優越感。

也就是說，客家人的教育之所發達，是因為他們秉承了其先人“衣冠望族”的血統，以及由這一血統所承繼下來的書香世家或詩書傳家的文化傳統。

且不說這一推論的前提是否成立³，僅僅從這一推論的結果來看，也是與客家地區的歷史大相

背離的。眾所周知，客家方言群是歷史時期北方漢人南遷的產物。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間期內，生活在贛南、閩西和粵東北毗鄰山區的北方移民，一直都處在顛沛流離的動蕩歲月之中。對於這些生存型的移民來說，生活中壓倒一切的急務，就是在遷入地站穩腳跟，生存下來。至於對子弟的教育，一時還很難顧及。故而，在唐代正式實行開科取士的時候，贛閩粵毗鄰的山區都還沒有設置學校的任何記載。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在贛南、閩西和粵東北三個區域內，其傳統的府學或縣學大多數都是在兩宋時期建立起來的。與其它地區、特別是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相比，這一建置無疑是較晚的。以下這圖表，就很能反映贛、閩、粵毗鄰地區學校的具體建置情況。

贛、閩、粵毗鄰地區府學、建縣建置表：

名 稱	建 置 時 間	資 料 來 源
贛州學	北宋慶歷年間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贛縣學	北宋皇祐年間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於都縣學	北宋天聖九年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信豐縣學	北宋景德年間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興國縣學	不詳，不晚於北宋治平年間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會昌縣學	不詳，不晚於元至正年間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安遠縣學	北宋慶歷四年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寧都縣學	不詳，不晚於北宋崇寧年間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瑞金縣學	不詳，不晚於北宋崇寧年間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龍南縣學	不詳，不晚於元朝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石城縣學	後唐長興二年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
汀州府學	北宋天聖年間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
長汀縣學	南宋嘉定年間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
寧化縣學	南宋建炎二年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
上杭縣學	不詳，不晚於南宋乾道年間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
武平縣學	南宋乾道年間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
清流縣學	北宋元符年間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
連城縣學	南宋紹興四年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
歸化縣學	明成化七年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
永定縣學	明成化十五年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
惠州府學	南宋淳熙二年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
歸善縣學	元泰定元年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
博羅縣學	不詳，不晚於宋代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
海豐縣學	不詳，不晚於北宋康定年間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
河源縣學	不詳，不晚於南宋乾道年間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
龍川縣學	北宋崇寧年間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
長樂縣學	南宋紹定年間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
興寧縣學	南宋嘉定年間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

贛閩粵毗鄰地區的學校不僅建置較晚，而且許多學校長期以來都是有名無實。例如，汀州府境內的長汀縣學，雖號稱始建於南宋紹興三年（1133），但當時只有一座象徵性的大成殿，而且還是汀州府學遷址時遺留下來的。至於學宇、學田等一應設施，長期都沒有得到解決。直到開禧年間（1205-1207），才正式立學宇，嘉定年間（1208-1224），才開始設置學田“以稟學職及弟子員”⁴，此時離號稱建學的時間已有近百年的距離。再如粵東境內的梅州學（歷史上梅州的行政隸屬關係十分雜復，故上表未列），號稱建於北宋崇寧年間，但長期以來，一直旋建旋廢。據地方志文獻統計，從南宋到元初，梅州學“毀於寇”的記錄就達三次之多⁵。更為重要的是，歷史上贛閩粵毗鄰地區一直就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區，移民社區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造成了這裏的很多縣級建置時建時廢，從而也影響到學校的建置。就是開發較早的贛南地區，也是如此。如贛州境內的龍南縣，本是西漢時期的南野縣舊地，唐天寶中改隸信豐縣，不久再升為鎮，五代時這裏隸屬吳國，改為場，南唐時正式設立龍南縣，隸虔州（即贛州），兩宋因之，元至元十四年（1277）再并入信豐，至大二年（1309）再設為縣⁶。行政建置的如此反反覆復，必然會影響到學校的建置。因此，贛閩粵毗鄰地區縣學的建立雖然基本上都集中在兩宋時期，但是真正沿續下來的卻只是少數。這就是明代以前客家地區學校總體建置的基本情況。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以前贛閩粵毗鄰地區的學校（府學和縣學）不僅建置晚，規模小，大多旋建旋廢，而且由於其官學的性質，從而決定了它們不可能以普通的平民百姓作為入學對象。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能夠進入縣學或府學就讀的，主要還是一些官宦子弟或富家後生。

除府學和縣學這類官方學校之外，宋元時期贛南、閩西和粵東北各地還設有“書院”之類的學校。這類學校主要由官方興辦，但也有官民合辦的，甚至還有民間私自開設的。不過從總體上來看，這類學校的數量並不多。除閩西地方志文獻中沒有這類書院的記錄外，贛南和粵東北地方志文獻中都有詳細記錄，其中有確切史料可考者，主要有以下十四所：

設置時間	名稱	性質	資料來源
南宋淳熙年間	贛縣義泉書院	官立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學校》
南宋咸淳八年	興國縣安潮書院	官立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學校》
宋初	寧都縣梅江書院	不詳	嘉靖《贛州府志》卷六《學校》
南宋淳祐年間	歸善縣豐湖書院	官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南宋紹興年間	歸善縣張普書院	私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南宋紹興年間	博羅縣張普書院	私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宋代	博羅縣鄭公書院	私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宋代	博羅縣羅浮書院	私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宋代	博羅縣權桂書院	私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宋代	博羅縣清灣書院	私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宋代	博羅縣清灣書院	私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元代	博羅縣釣鰲書院	私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宋代	龍川縣贊峰書院	官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宋代	興寧縣探花書院	私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

需要指出的是，宋元時期贛南、閩西和粵東北地區的書院，大多數也都有名無實，與當時其它地區以講學興教為主要內容的書院是完全不同的。像上表中惠州境內的許多書院，基本上都是有名無實，如歸善縣境內的豐湖書院，最初只是為了紀念當地或流寓這裏的文人學士，再如歸善和博羅縣境內的張普書院、鄭氏書院等，都是當地文人學士的早年讀書之所，後來這些人由於考中了進士，其後人或鄉人才將其讀書之所加以修葺，美其名曰書院，因此完全是一種象徵性的建置，與真正的書院相差甚遠。當然，也有一些書院具有實質性的內容，如博羅縣境內的釣鰲書院，創辦之初，即“置渡田若干，以贍來學”⁷。不過，這樣具有實質性內容的書院，在贛南、閩西和粵東北都是不多見的。

從贛閩粵毗鄰地區學校教育發展的具體進程來看，宋元時期影響這裏學校教育的因素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地方官吏對學校教育的重視程度，第二個就是地方文人學士對教育的重視程度，第三個則是科舉人物和流寓的文人學士對地方教育的促進作用。

先看地方官吏對教育的重視情況。宋元時期，贛閩粵毗鄰地區的學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地方官吏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如果一個官吏重視教育，則這一地方的學校教育就有可能發展。閩西地區學校教育的發展，就與以下幾個地方官吏對教育的重視是分不開的。

鄭強，字南美，福建長樂人，南宋紹興二年（1132）知汀知事，“始至郡，禮廟學荒圯已甚，慨然有更築意……即日度地，建於州東……且市膏腴田以增餼稟，擇師儒以嚴課程，諄諄教訓。於是升堂者數倍疇昔，人以不學為恥。越三年，登進士第者四人。”⁸

林，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知汀州，“合試六邑之士，創書院二所，所與郡士，講訂甚多。”⁹

孫瑞，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知汀州府長杭縣，“首創學舍，給田以養士。假日輒蒞學，與諸生講論經史，自是士風稍振，而邑人感人。”¹⁰

再看粵東北：

陳鶴，字聞野，福建仙游人，北宋宣和六年（1124）進士，任惠州僉判。當時，“惠俗僻陋，士風不振”，陳氏“大興學校，親典教事，執經者數歲百人”，惠州境內“自後文士彬彬”。史稱“惠之倡學，實自鶴始。”¹¹

贛南的情況也是如此：

趙善繼，北宋後期知虔州（贛州），“以興學宣化為首務，閭閻靡然成俗，民安士業，訟牒希簡。”¹²

伯篤魯丁，蒙古人，元初任贛州達魯花赤，上任伊始，“即飭學舍，延師儒，養育士類，闡明教化，俗亦稍變。”¹³

再看各地文人學士的倡導對於地方教育的影響。

如粵東北：

羅孟郊，惠州興寧人，弱冠結廬羅嶺以學，鄉中子弟從之，天聖八年（1030）舉進士。史稱在羅氏的倡導下，興寧一邑“始多學者”。¹⁴

潘預，字晉卿，惠州博羅人，篤學該洽，以古文為鄉黨推重，尤深於《周易》。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以特科授宜州司法參軍。後被聘到嶺南講學，“訓迪諸生，南州經學自是日盛。”¹⁵

在贛南：

溫革，贛州石城人，少業進士，累試不第，“慨然嘆曰：‘不得諸外，蓋求諸內；不在吾身，當在吾子孫。’”寶元（1038-1040）年間，“詣闕上書，願以家貲市監書。得請歸，建樓貯之。”又辟義館，“凡遠邇來學皆稟之，用是俗習一新，至今頌之。”¹⁶

陳維，字康侯，宋代贛州於都人，年少問學，博聞強記，五舉不第，後應邑人之邀，開義館教授，“鄉閭四方學者日至”¹⁷。

劉鑄，字季治，宋季治，宋代贛州贛縣人，性素剛鯁，淹貫經史，生平交游多名流，讀書天竺山，“從學者百餘人”¹⁸。

至於科舉人物對地方教育的潛在影響，更是不容低估。據統計，宋元時期，贛州府屬各縣共考中進士163人¹⁹，汀州府屬各縣共考中進士92人²⁰，惠州府屬各縣共考中進士60人²¹。科舉人物的出現，刺激了贛閩粵毗鄰地區社會各階層對學校教育的重視。例如，惠州府博羅縣人張宋卿，於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考中進士，史稱“自張宋卿魁南宮，文學之風始盛，業儒而為士者，頗偕蓰於鄰邑”²²。類似於這樣的記載，在有關地方志文獻中更是不甚枚舉。

除科舉人物之外，不同時期流寓贛閩粵各地的文人學士，也對當地的教育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由於贛閩粵毗鄰地區地處深山，交通不便，開發滯後，故而長期以來，一直是統治者“以處遷客”的重要場所。其中，不少文人墨客也由於種種原因而流寓到這裏。如北宋的蘇軾、蘇轍兄弟，就被流放到粵東北的惠州境內長達四年之久。由於這些人都以文章學術而著稱，流風餘韻，影響所及，都會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到當地教育的發展。

總而言之，明代之前，在贛南、閩西和粵東北各地，由於移民社會的流動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口和行政建置的不穩定性，加之區域開發的相對滯後，從而使得這裏的學校教育在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後的。在唐宋以後中國經濟和文化重心實現南移的這一大前提下，相對於南方各文化發達的區域來說，贛閩粵毗鄰山區不能不說是一個特例。

II 客家地區學校教育的發展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贛閩粵毗鄰地區學校教育的長足發展開始於明代中後期。這一點，只要打開明代中後期客家地區的地方志文獻，即可一目了然。

在贛南，據嘉靖《贛州府志》卷一《地理》記載：

於都：“力本右文，士多向學。”

寧都：“士和務學，無浮靡習。”

又據嘉靖《南安府志》卷六《禮樂志》記載：

（上元節後）家有弟子者，即聚議延師，雖貧者及鄉落之家，相聚亦以此為首事，謂之“起學”。

同一時期編修的《南康縣志》卷一《風俗》也記載道：

（正明）擇吉，父兄各以童蒙就外，傳曰“起學”。

在閩西，據嘉靖《汀州府志》卷一《風俗》記載：

士夫知讀書進取，間有魁元……教子讀書，比屋皆是……學校少高年之生徒，家庭多篤孝之嗣續。

上杭：“士能勤學問而擢科名……衣冠文物，頗類大邦。禮樂詩書，實多濟美。”

武平：“問學英豪，時中科第。子弟俊秀，多入學庠。”清流：“士勵詩書而科甲有。”

連城：“士知讀書尚禮，俗重登科取名。”

永定：“取士登科者不乏人，入學接踵者恒多。”

這一時期編修的《清流縣志》卷二《風俗》亦載：

君子知義理而文藝亦工。

在粵東北，據明天順《惠州志》（轉引自明嘉靖《惠州府志》卷五《地理》）記載：

惠州：“郡人頗好儒。”

博羅：“頗尚詩書，自張宋猶豫卿魁南宮，文學之風始盛，業儒而為士者，頗倍蓰於鄰邑。”

海豐：“秀民之家，多事儒業，弦誦之聲相聞。”

河源：“士習詩書，不下他邑。”

龍川：“頗讀書好禮。”

當然，就是在明代中後期，客家地區的學校教育發展還是極不平衡的。特別是在粵東北的部分客家地區，還存在着不少空白。明代天順年間編修的《惠州志》在記載長樂（今五華縣）的民風民俗時，曾有着“讀書取足記姓名而已”的記載。同一時期的興寧，也有着“習儒者少”的記錄²³。

到了清代，客家地區的學校教育在總體上更是躍上了一個新的階段。乾隆年間編修的《汀州府志》，在記述當時汀屬各縣的文化教育狀況時，有着如下的記錄²⁴：

寧化：“士多好古，尤喜文詞。他如潑墨染箋，互相仿效，模山范水，別有師傳。譜奕調絲，治病相宅，初無口授，各具心靈。”

連城：“士尚文，人習武。”

上杭：“文物頗類大邦，科名甲於諸邑。”

武平：“任俠輕財，習文重武。”

永定：“家弦戶誦。”

至於贛南，此時的教育更是盛極一時。道光年間編修的《定南廳志》，對當時贛南客地區文化教育狀況，有着如這樣的記載²⁵：

喜讀書，山谷小村皆有童塾。子弟至七歲即延師啟蒙。士務實修，鮮走聲氣，為文尚清真，而通今學古亦不乏焉。在粵東北的客家地區，先前文化教育比較落後的地方，到清代之時也有着長足的進步。同治年間編修的《韶州府志》卷十一《輿地略》，在記載當時韶州府屬各縣的情況時說：“士俗醇朴，頗知詩書，科目代不乏人。”

客家地區教育發展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各級各類學校在明清時期的大量湧現。就閩西的情況來看，歷史上的汀州府屬各縣，除了官立的縣學之外，很少有其它各類學校。但是，到了清代，情況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汀州府屬的寧化縣為例，清代雍正年間，興善和龍下兩裏，就各設有社學一所。光緒年間，又在寧化城區設立義塾三所。這類社學或義塾，大多延請有學行的秀才訓迪平民子弟。再如，在整個明代，寧化一縣僅有書院一處，而且旋建旋廢。但是，到二清代，僅康、雍、乾三朝，寧化縣城境內就建有書院三處，大者有房舍五十餘間，費銀1200餘兩。至於設在鄉間的書院，則數目更多。據不完全統計，有清一代，設在寧化縣鄉間的就有翠峰書院、思樂書院、牖民書院、毓秀書院和道南書院等多處²⁶。

在社學、義塾和書院之外，規模不等的私塾更是難以確數。在客家地區，私塾向有經館和蒙館之分。所謂蒙館，主要負責對學齡兒童的發蒙，其招收的對象是八、九歲的入學兒童，教授的重點是識字和寫字，而不講解文意，主要讀本則是“三字經”、“百家姓”或“千字文”一類的童蒙讀物。

所謂經館，亦稱“通講”，招收那些曾經受過啟蒙教育的青少年入學，主要教授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同時要求學生作時文（應試科舉的八股文）、對子、詩詞和文章。在清代，客家地區的私塾究竟有多少，恐怕是誰也無法講清楚的。就閩西境內的寧化縣來看，直到民國24年（1935年），全縣尚有私塾52所，塾師52人，學生513人。翌年更增至65所，塾師65人，學生1187人。²⁷ 其數量之多，影響之大，由此可以想見。

再就粵東北的客家地區來看，情況也是如此。地處粵東北山區的龍川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客家住縣。該縣始建於秦代，是贛閩粵毗鄰山區建置最早的一個縣。但是，長期以來，這裏經濟落後，交通不便，文化教育滯後，向被視為“荒徼”之地。但是，明末清初以來，這裏卻文風鼎盛，人才輩出。正像雍正年間任龍川縣令的盛熙昌在《尊經閣記》中所說的那樣：“龍川於唐宋為荒徼，自蘇穎濱居謫居於此，士子炙其言論，稍知窮經。歷元迄明，文物茲盛。我國家定鼎以來，重熙累治，蠻煙瘴雨，悉變為霽日薰風，而學校中亦復科名鵲起。”據統計，從宋至清，龍川縣全境共建有書院十七處，而清朝一代就建有十四處，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²⁸。有清一代，龍川境內不僅書院林立，而且講學之風極為盛行。如建於康熙年間的三台書院，就一直聘請當地碩學之士執掌講席。該縣乾隆年間的舉人楊庭釗，“聘掌三台書院十載，講學論文疊疊不倦，邑中名士多賴裁成。”²⁹ 書院的次第出現，講學之風的盛行，有力地推動了地方上教育的發展與普及。

隨着學校教育在客家地區的發展與普及，以科舉考試而金榜題名的客家人士也越來越多。根據對閩西各縣地方志資料的統計，在整個科舉時代，

汀州府屬下的長汀縣考取進士70人，舉人265人；連城縣考取進士29人，舉人263人；寧化縣考中狀元1名，進士50人，舉人152人；武平縣考取進士20人，舉人157人；上杭縣考取狀元1名，進士50人，舉人381人；永定縣考取進士36人，舉人335人。這些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者，大多數都生活在清代，生活在清代之前者，可謂寥寥無幾。在這六個縣份中，永定縣的情況最能說明問題。永定建縣於明成化十四年（1487），為汀州府屬建置最遲者。但是，進入清代之後，這裏“文風朴茂，甲第科巍，得為數郡之冠。”³⁰ 從永定建縣至1905年廢除科舉，短短的四百餘年之間，永定一縣竟走出了371位進士和舉人。除此之外，也是從永定的土樓裏，走出了12位翰林，其中坎市鎮青坑村的一戶廖氏人家，竟是四代五翰林，而大溪鄉的巫氏也是兄弟兩翰林。所有這些，直到今天依然被生活在土樓裏的客家人傳為佳話。

粵東北的情況也很能說明問題。清末翰林、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首任系主任賴際熙，曾編輯《崇正同仁系譜》一書。據該書《選舉》卷的詳細統計，粵東北境內的各客家住縣，明代共考出進士67名，舉人654名；但是，到了清代，進士則共有187名，舉人更是增至1278名，差不多都比明代番了一番³¹。明代中期才正式建縣的偏僻山邑大埔，清代則出了33位進士、194位舉人。此一比例就是與當時文化教育十分發達的江南地區相比，也是毫不遜色的。同處粵東北山區的興寧縣，明代嘉靖年間編修的縣志還說這裏是“習儒者少”，但是，有清一代，該縣則出了10位進士、83位舉人³²。科舉人才之盛，真可謂今非昔比。

清代客家地區人文的發達，不僅表現在科場人物之眾，更反映在大批專門人才的湧現方面。長

期以來，贛閩粵毗鄰的客家地區，由於人多地少，經濟不振，風氣閉塞，文教不昌，故而很少產生在歷史上留下重要影響的專門人才。但是，到了清代，情況則驟然改變。清初以來，在贛閩粵毗鄰地區的這塊貧瘠的紅土地上，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經國濟世的專門人才。在政治方面，康熙朝被加封為少傅兼太子太傅的吳六奇、咸同年間歷任江蘇、福建巡撫的丁日昌、同光年間出使日本的外交家何如璋、黃遵憲等，都是客家人。在軍事方面，中法戰爭中率兵抵抗法軍入侵的馮子材、劉永福，“馬關條約”後率軍抵抗日軍入台的丘逢甲等，也都是客家人。在學術方面，兼通四部的吳蘭修，一代才子未湘，博學善文的溫仲和等，都是清代學術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藝術方面，如雷貫耳的“揚州八怪”畫派中，就有兩位（黃慎和伊秉綬）是客家人。

III. 家族組織與客家地區的學校教育

客家地區的教育之所以自明代中期以來能獲得如此巨大的發展，首要的原因應歸之於明末清初以來客家地區社會結構的變遷。自明代中期以後，生活在贛閩粵毗鄰山區的北方移民及其後裔，經過與當地原住民長期的、歷史的互動，終於形成為一個獨立的漢語方言群。他們一改過去“客人”或“客民”的身份，轉而返客為主。隨着客家人返客為主的身份性轉變，贛閩粵毗鄰地區傳統的移民社會，也開始發生結構性變遷，血緣家族開始成為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形式。基層社會組織的家族化，是明清時期客家地區學校教育發展與普及的最主要動因之一。

家族組織之所以能成為學校教育發展的重要動因，原因有兩個方面。

其一，基層社會組織的家族化，打破了原來以一家一戶為基礎的分散的、孤立的社區體制，轉而代之以血緣關係為軸心的、以同姓家族各家各戶為紐帶的社區體制，從而有利於動員整個家族（甚至宗族）的力量，在鄉村僻野之間，興為學校，發展教育。

前已指出，宋元時期贛閩粵毗鄰地區的學校不僅數量少、規模小，而且大多有名無實。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要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勢必自己辦學。但是，除了官宦人家或富商巨室之外，普通的平民百姓根本就沒有經濟實力來私家辦學。因為，興辦學校不僅要有學舍，而且還要供養執教的人員。這對於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無疑是連想也不敢想的事。但是，隨着明清以來客家地區基層社會組織的家族化，這個問題就能夠得到解決。

如同其它地區的家族組織一樣，明代中後期以來客家地區出現的家族組織，也都以興辦“族學”作為其“敬宗收族”的前提。如閩西連城新泉的張氏家族，就把開辦族塾、族學寫進其族規之中，以便使家族的學校教育成為一種規範化的永久性事業。據新泉《張氏族譜·族規》記載：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作養多方，所以人才彬彬輩出。今議設義學二所，經師一所，在山東樓；蒙館一所，即在祠內。但束修諸費無所從出，酌量於各房祖蒸嘗內摘捐，並好善樂施者助出。或殷實家有捐至十兩以上者，合族以“培植後學”四字扁額送至其家以獎之。³³

顯而易見，新泉張氏家族興建的“義學”、“經師”和“蒙館”，是動用了家族的“族產”才完成的，至於束修諸費，則由各房“蒸嘗”中摘捐，也有一部

分由族眾個人資助。因此，是一個動員整個家族力量興學的典型。

像新泉張氏這樣，以整個家族的力量來興辦族學，早在明代中期即已開始。但是，數量更多的還是出現在清代。據光緒《嘉應州志》卷十六《學校》記載，在清代嘉應州境內，有不同家族興建的各種學校：

“西洋堡社學二處，皆在松坪鄉，一康熙間邑庠生李祥建，光緒七年舉人李天香與族眾重修，一康熙間李居傍及其子舉人李壯華建。”

“雁洋堡義學在雁洋村啟平圍崗側，光緒四年雁洋首約李氏合族創建。”

類似的“社學”和“義學”，在清代的贛南、閩西和粵東北各客家地區，都是普遍存在的。有的家族，或者是由於族人眾多，聚落太大，或者是由於經濟實力雄厚，往往還同時辦有幾個學校，前文提到的連城新泉張氏家族，就同時辦有二所義學、經師一所和蒙館一處。再如閩西清流縣餘朋鄉東坑村陳世家族，從明代末年開始就一直興辦族學，到清代乾隆年間，一共興辦了蒙館四所（坑頭書院、坑源書院、黃崗書院和六有軒書）、經館四所（慧山書院、龍吟靜室、臥雲書院和桂園書院）³⁴。

其二，家族組織建立之後，必須置辦一定數量的“族產”以維繫家族體制的正常運轉，而“族產”的存在，又必然為家族教育的持久發展提供物質保證。

家族組織是基於血緣基礎之上的民間性組織，從法理的角度來講，它是同一姓氏之間的自願性組織，故而不同於其他強制性的社會組織。由血

緣關係與地緣關係相結合而產生家族組織，在經過一段時間發展之後，其內部必然會產生種種裂變，特別是由於貧富分化而產生的階級或階層性質的裂變。隨着家族內這種裂變的加深，一些日益貧困化的家庭就可能游離開家族組織，久而久之，勢必會影響到家族組織的凝聚力，甚至會導致家族組織的解體。正因為如此，歷史上各個姓氏家族無不注重通過設置“族產”，來消彌家族組織內部的貧富分化，從而達到“敬宗收族”的目的。

從贛閩粵客家地區的歷史實際來看，這裏的家族組織在營造“族產”的過程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設立族田。在歷史上，族田的種類很多，有所謂“義莊”、“義田”，也有所謂“祖嘗”、“嘗業”“嘗租”或“蒸（丞）嘗”等。根據內容而論，族田又可分為祭田、墓田、蒸嘗田、潤族田、義宗田、學宗田、義塾田等等³⁵。客家人一般稱之為“丞嘗”或“祖宗血食”。

在名目眾多的族田之中，用於支付家族內學校教育費用的部分，一般都佔有相當的比重。儘管家族內興建的“族學”或“族塾”從名義上為族中的所有子弟提供了均等的就學機會，但是由個各個家庭的具體情況不同，對於一些貧窮的家庭來說，子弟的入學不僅是一筆相當不薄的經濟負擔，而且還意味着準勞動力的喪失。族田內用於支付家族教育費用的所謂“資儒田”或“書燈田”（總稱為學田）等，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設置的。

在有關地方志文獻中，有關客家家族設置學田的情況可謂所在皆是，茲引証數條如下：

在閩西：永定縣“官吏士民捐置田稅舊學以贍貧生，資膏火、科舉、膳義學者。”³⁶ 寧化縣“因

族人艱於秋試，因並資賢堂釀城鄉大戶租數百石，羅收其息，給赴試者，以惠士人。”³⁷

在粵東北：“俗稱祭田為丞嘗，亦有謂祖宗血食……丞嘗田無論巨姓大族，即私房小戶亦多有之。其用至善。偶見《新寧志》記載：‘土俗民重建祠，多置祭田，歲收其入，祭禮之外，其用有三：朔日，進子弟於祠，以課文試童子者，助以卷金，列膠序者，助以膏火，及科歲用度，捷秋榜，赴禮闈者，助以路費。’”³⁸“望族置書田或數十畝，或百畝，惟進泮者得入其租，他子孫不與，所以示鼓勵也。”³⁹

在贛南：“每祠必置產以供祭祀，名曰公堂。眾舉一二人司其出入。子孫登科第，入鄉校者，則給以花紅銀，赴試亦助其資斧，或歲分谷若干擔以贍之。”⁴⁰

贛閩粵客家地區的學田，其來源是多種多樣的。大致說來，有如下幾個途徑：

其一，家族祖產。

歷史上不少客家家族在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都會積累一定數量的族產。一些有眼光的族人便會將其中的一部分辟為學田，用以支付家族的學校教育。如閩西上杭白砂鎮的傅氏家族，從其十世祖開始（約在明代中期），就在各派始祖的名下設田資儒田。如其十世祖就擁有資儒田4.6石，又有童生谷物石；十一世祖亦有資儒田2.4石；十三世祖更是增加到22.14石；不久，又增到150.4石。儘管有了如此不薄的固定收入，傅氏的後人還是不斷的捐產加入。久而久之，傅氏的這筆資儒田產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成為其家族教育得以持續進行的物質基礎。⁴¹

其二，家族中的官紳捐贈。

在許多客家家族的族規約中，都有官紳必須捐助學田的強制性規定。如閩西武平的李氏家族，便規定大學士捐田140拜，共子孫可永遠得胙60斤，尚書捐田120拜，子孫得胙50斤，總督以下類減⁴²。前文提到的閩西永定縣和寧化縣兩例族田，都是官紳捐贈的典型。

其三，族眾捐助。

客家家中一些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族眾，往往也會自行捐助學田。這方面的記載也很多。如長汀縣的廖雍，“割己田襄立義庄，為赴闈費。”廖國翰，“割己屋以擴祖祠，置義田以贍貧士”⁴³。永定縣的廖聘清，“捐義田助士子應試之費”⁴⁴。

如果說族學和族塾為客家人家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場所，那麼族田的設置則為家族內一般子弟的就讀，提供了基本的物質保障。正是在這兩個大前提之下，明代中後期以來，貧困的客家山區才會出現“家弦戶誦”或“教子讀書，比屋皆是”的局面，客家地區的學校教育才躍上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

家族化的社會組織，還能夠為分散在各地的族中子弟赴考應試提供各種有利條件。在清代，許多客家宗族為方便分處各地的宗族子弟赴考應試，都在縣、府或省會設立試館。如閩西廖氏宗族，就曾在嘉慶年間把散居於永定、上杭、龍岩、長汀和福州等地的族人聯合起來，在福州合建一所試館，並立有各同：“廖實蕃公、高峰公裔孫岩州、上杭、永定、寧洋廖辟初、際嘉等……契買省垣南營陳孝群等房屋一所，立為試館……每逢鄉試屆朝……高峰公裔孫居住左畔，實蕃公裔孫居住右畔……其平時出租，不分左

右，賃錢歸眾，守祠人不得私匿。”⁴⁵ 在閩西和粵東北，常常有一些大型的同姓大宗祠，光緒《嘉應州志》所載“州城復有大宗祠，則並一州數縣之族而合建者”，說的就是這種。這種大宗祠在血緣的基礎上又滲入地緣的因素，供奉一個同姓的名人為遠祖。它既是同姓族眾祭祀的場所，更兼應試會館的功能。每逢大比之年，這裏便成為同姓士人居停的場所。道光年間，閩西廖氏家族就在汀州府建有“祖祠紹彩堂”。清代末年，該族又集資重修“八邑家祠”，也就是八縣同姓的大宗祠，其目的也“非但足妥先靈，亦可多彰試士。”⁴⁶

IV. 經濟變遷與客家地區的學校教育

客家教育在明清時代的長足發展，也得力於客家地區經濟生活的變遷。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客家人一直是作為一個墾殖的群體生活在贛閩粵毗鄰山區的。他們世代都是以這塊紅土地上大大小小的盆地和山間梯田作為基本的謀生手段的。農業長期以來一直是客家人最主要的生產部門。但是，進入清代之後，由於“攤丁入畝”的實行，加之過去的移民生活也慢慢地為定居拓殖所取代，故而客家地區的人口激增。在急劇增長的人口面前，原本就山多地少的贛閩粵毗鄰地區，此時所面臨的人地矛盾就更加突出。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客家地區的經濟生活開始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首先，在閩西等客家地區，經濟性的農業獲得了突破性的發展，特別是煙草和藍靛等經濟作物，得到廣泛的種植。據有關史料記載，煙草在明代中期傳入福建。由於它“能令醉，且可避瘴氣”，具有“殺蟲兼潤苗根”的實際功效⁴⁷，故而很快便在瘴氣肆虐的閩西和粵東北地區種植起來，

成為廣大客家人十分愛種的經濟作物。加之，煙草的栽培比起糧食作物的種植，獲利多而費時少，“一畝之收可致田十畝”，因而山民便盡力栽煙謀利。到了清代，閩西汀江流域的汀州府屬各縣，已成為全國著名的產煙區。據當時的文獻資料記載，汀州府屬各縣，“膏腴之地，種煙者十居三四”，其中又“以（上）杭、永（定）為盛。”當時福建最為著名的“金絲”、“蓋露”等優質名煙，“皆杭、永人為之。”⁴⁸ 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金絲”和“蓋露”等煙草，已像福建傳統的名茶“紫竹”和“先春”一樣，廣為人知，吸煙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民俗習慣。特別是在清政府徵收煙捐，正式使煙草種植合法化之後，閩西和粵東北各地的客家人，更是競相種植。一向以煙出名的永定、上杭等縣，更是“人情射利，棄本逐末，向皆以良田種煙”⁴⁹，以至於出現了“春水滿溪時走艇，人家繞廓盡栽煙”的景象。在粵東的大埔等縣，客家人也是“競尚種煙，賈客販運江西發售。”⁵⁰ 在煙草業之外，藍靛也是閩西和粵東北客家人廣為種植的一種重要經濟作物。明末以降，以汀州府為中心的閩西各客家住縣，幾乎都廣泛地種植藍靛。在當時全國的染料市場中，汀江流域各縣的制藍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上杭等縣，“邑上曩時業此甚多，多獲厚利。”⁵¹ 稍後，隨著閩西和粵東北部分客家人向內地的倒遷，在江西、浙江和湖南等山區，也出現了專門以種植藍靛為生的客家移民。據乾隆年間編修的《上杭縣志》記載，“本邑種藍者，其利猶少，（上）杭人往南浙作靛，獲利難以枚數。”⁵²

除了經濟性的農業獲得巨大發展之外，客家地區的手工業和工礦業也有著長足的進步。如粵東的大埔縣，客家人“終歲伐木作柴，連舸運至府城售賣。其大木可作棟梁者，連數百枝為群排，運

至蔡家園貿易，多獲厚資。”⁵³ 而汀州府屬的上杭、長汀、連城等縣，造紙業則十分發達。如長汀，“邑人賃山栽竹，沒楷造紙。”⁵⁴ 在上杭，“通邑有山處多種竹，皆出紙。”⁵⁵ 至於連城出產的“大東溪”紙，更是遠近聞名。據當時的文獻記載，凡是印有“大東溪”字樣的紙張，一到漳州或汕頭等地，便被商人搶收購一空。隨著造紙業的發達，閩西民間的手工印刷工藝也迅速提高。在清代，閩西山區的西堡鄉，竟發展成為中國古籍雕版印刷的四大基地之一。當時，僅四堡一地的著名書坊，就達二十餘家。

明代中後期以來，閩西和粵東北地區的手工冶鐵業也十分發達。如長汀、上杭、寧化等縣，都有規模較大的鐵礦開採和手工冶煉，而且這裏的許多鐵礦開採工匠還遠走他鄉，以手工技藝謀生於異域。早在明代的嘉靖年間，惠州和韶州等山區在開採鐵礦時，就曾“招引福建上杭等縣無籍流徙，於每年秋收之際，糾集凶徒百千成群，越境前來，分布各處山崗，創寮住扎。每山起爐，少則五六座，多則一二十座。每爐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礦，煽鐵取利。”⁵⁶ 此外，嘉應州屬的平遠縣，則以盛產葛布和生鐵而著名。乾隆年間，當地的商人就葛布載至蘇杭一帶，將生鐵販至安徽的蕪湖等地，“以取利焉”。⁵⁷

在商業貿易方面，閩西和粵東北的客家人，在清代也有不俗的表現。例如粵東的大埔縣，不僅經商的人數眾多，而且規模也很大。據乾隆《大埔縣志》記載，乾隆時期，大埔商人就“經商於吳、於越、於荆、於閩、於豫章……足迹遍天下。”⁵⁸ 在閩西，甚至還形成了不少資產巨大的家族性商幫。永定的煙商、上杭的藍商和茶商以及連城四堡的書商等，甚至還在全國各地建立了

商業性的會館。如乾隆年間，“江西、浙江、廣東及上海、佛山、漢口等處，於省郡總會館外，皆有上杭會館。”⁵⁹ 同一時間，汀州府屬各縣的商人，在浙江的溫州西門外，還共同出資建立了天妃宮，作為集會之所。⁶⁰ 粵東北地區的客家籍商人，此時也十分活躍。在清代，以大埔為主的粵東北商人，“以蘇瀘二地為常住之所”。乾隆年間，大埔商人在蘇州胥門外橫塘還建有大埔山莊，擁有市房三所，同時還在吳縣建有六處大埔公墓。⁶¹ 這類商人的力量之大，資產之巨，由此可以想見。

在傳統中國，耕讀傳家可以說是平民大眾所恪守的基本生活理念，客家人當然也不例外。正因為如此，當客家地區的經濟生活發生歷史性的變遷，許多家族在積累了相當的物質財富之後，都不約而同地把關注的重點投向對家族子弟的教育之上。如閩西連城四堡的鄒氏家族，以印書而富甲一方。在該家族的《家訓》中，就對族中子弟的教育進行了詳細規劃：“吾家人醇俗厚，半讀半耕，一脈書香，繩繩相繼者，其來久矣……繼自今為先父者，必於嬉嬉童稚中，擇其不甚玩鈍者，束之於黨塾，聘名師，招益友，俾之磨礱砥礪，相與以有成。將來出為名臣，處為名儒，大為深山邃谷間生色。即不然，知書識字之人，縱置身農工商賈之餘，亦有儒家氣象，庶不辱我詩書禮儀之鄉。”⁶² 另一位四堡書商馬權文，“開坊募梓，集書板充棟，致貲倍饒……猶自梅讀書不果。得屋後餘地，構精舍，聘名儒，優隆北面之儀，款洽尊師之意，萃諸令器督課其中。”⁶³ 像馬氏這樣，在致富之後即斥資興學，大力發展家族教育者，在客家地區，可謂十分普遍。

隨着客家地區教育的發展與普及，人們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明清之際，正值客家方言群由生存型移民而進入發展階段，原先顛沛流離的移民生活已經成為過去，在實現了返客為主的身分性轉變之後，發展則成了當務之急。在這種情況下，教育成為他們自衣、食、住、行之後的另一個頭等大事。於是，在客家民間，一個又一個關於教子讀書的民諺不脛而走，所謂“有子不讀書，不如養頭豬”，又所謂“送子千金，不如教子一字”等，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客家人對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視。清代光緒年間編修的《長汀縣志》，曾對當時民間重視子女教育的情況有過這樣的記載：“〔長〕汀在萬山中，踞閩上游，波石凌悍，峰嶺崎嶇。士生其間，性多兀傲……國朝敬教勸學，邑士從風，黜華崇實，率為有本之學。五經、性理、史鑒諸編，皆背吟成誦。子弟一隸學官，父兄相期以遠大。”⁶⁴ 所謂“父兄相期以遠大”，就是指對入學子弟抱着極高的期望。清代閩西連城籍文人楊登璐的一首竹枝詞，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客家人對教育的重視⁶⁵：

丈夫怎能薄功名，一着藍衫無事爭。
某日文宗傳歲試，村南村北讀書聲。

說到客家人對教育的重視，凡是到過客家地區人，就一定會有特別深刻的感受。因為，在客家地區，日常生活中的事事物物幾乎都隱隱約約地折射出客家人對教育的特殊感情。在閩西等客家地區，一些家族的祠堂門前總是矗立着類似與旗桿那樣的東西。只不過這樣的旗桿不是木制品，而是石制品。

這便是客家人所說的“石龍旗”。從外形上看，石龍旗和普通的旗桿相似，但它卻是用青石條鑿成的，每根高十餘米，座基則用方形長條石做成，高約一米。與旗桿相似的石龍旗，決不是用來懸掛旗幟的。原來，每對直立的石龍旗，都代表着這個家族歷史上某一位成功的讀書人。那光滑而又挺直的木桿，或許正象徵着這位讀書人的人生之路，順達、成功而又圓滿。在客家地區凡是有人考取秀才、舉人或進士，家族便要在祠堂的門前為他鑒立兩根高的石龍旗，並在座基上刻着此人姓名、功業、生平以及立石龍旗的時間。如果以後又有人考取了功名，就要再立一對石龍旗。所以，祠堂前的石龍旗越多，就表明這個家族考取功名的人越眾。當然，客家人用這種方式不只是為了表彰家族中的先賢，更不只是向外人的炫耀，而是為了策勵來者，即勉勵家中的子弟像先賢那樣，發憤苦讀，爭取金榜題名，從而光宗耀祖，澤惠後人。

至於客家人處處懸掛、鐫刻或張貼的楹聯，更是以崇尚文教為中心內容。所謂“教子讀書，縱不超群也脫俗；督農耕稼，雖無餘積省求人”，所謂“興邦立國民為體，教子治家讀乃先”，又所謂“無情歲月增中減，有味詩書苦後甘”，等等，無不洋溢着客家人對教育的崇尚。素有永定圓樓之王美稱的“承啟樓”，其大門的門聯是：“承前祖德勤和儉，啟後孫謀讀與耕”。方樓王“遺經樓”的大門門聯則是：“筆岫屏山喜見文光萬象，壕潭柳灞欣看浪級千層”。字裏行間，弘揚的是耕讀持家的傳統，流露的是對文教的無限景仰。

V. 註釋

- 1 以上引文均見程志遠編：《客家源流與分布》一書中《外國人對客家人的評價》一節。
- 2 這一觀點發軔於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後來台灣學者陳運棟在《客家人》一書中以及大陸學者張衛東在《客家文化》一書中都有進一步的發揮。引文出自陳運棟：《客家文化的源流》，學術會議交流論文。
- 3 關於客家先人均系“衣冠望族”的觀點，本人在拙著《客家學導論》中有詳細的批評，詳請參閱拙著第 71-75 頁。
- 4 嘉靖《汀州府志》卷七《學校》。
- 5 光緒《嘉應州志》卷十六《學校》。
- 6 嘉靖《贛州府志》卷一《地理》。
- 7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學校志》。
- 8 嘉靖《汀州府志》卷十二《名宦》。
- 9 嘉靖《汀州府志》卷十二《名宦》。
- 10 嘉靖《汀州府志》卷十二《名宦》。
- 11 嘉靖《惠州府志》卷十二《名宦》。
- 12 嘉靖《贛州府志》卷八《名宦》。
- 13 嘉靖《贛州府志》卷八《名宦》。
- 14 嘉靖《惠州府志》卷十三《人物》。
- 15 嘉靖《惠州府志》卷十三《人物》。
- 16 嘉靖《贛州府志》卷十《隱逸》。
- 17 嘉靖《贛州府志》卷十《隱逸》。
- 18 嘉靖《贛州府志》卷十《孝友》。
- 19 據嘉靖《贛州府志》卷八《選舉》。
- 20 據嘉靖《汀州府志》卷十三《人物》。
- 21 據嘉靖《惠州府志》卷四《選舉表》。
- 22 嘉靖《惠州府志》卷五《地理》。
- 23 嘉靖《惠州府志》卷五《地理》引天順《惠州志》。
- 24 乾隆《汀州府志》卷六《地理》。
- 25 道光《定南廳志》卷六《風俗》。
- 26 以上材料均見新編《寧化縣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64 頁。
- 27 新編《寧化縣志》，第 664 頁。
- 28 龍川縣客家研究會編：《古邑龍川》（內部贈閱本），第 47 頁。
- 29 嘉慶《龍川縣志》，轉引自《古邑龍川》第 46 頁。
- 30 道光《永定縣志》，轉引自胡大新：《崇尚教育的汀州客家人》，收入《汀江與客家人理論研討會議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1996 年版。
- 31 賴際熙：《崇正同仁系譜》第四、五《選舉》，香港崇正總會 1995 年重印本。
- 32 以上統計均據賴際熙：《崇正同仁系譜》卷五《選舉》。

- 33 轉引自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第203頁。
- 34 江椿福、陳立忠：《清流縣餘朋鄉東坑村民俗調查》，楊彥傑主編：《閩西的城鄉廟會與村落文化》，第362頁。
- 35 參見張研：《清代族田與基層社會結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頁。
- 36 乾隆《永定縣志》卷三《義租》。
- 37 民國《寧化縣志》卷十四《列傳》。
- 38 光緒《嘉應州志》卷八《禮俗》。
- 39 咸豐《興寧縣志》卷十《風俗》。
- 40 同治《興國縣志》卷一一《風俗》。
- 41 楊彥傑：《閩西宗族社會研究》，第53-54頁。
- 42 武平《城北李氏族譜》卷末《產業類》，轉引自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第70頁。
- 43 光緒《長汀縣志》卷二十四《義行》。
- 44 民國《永定縣志》卷十三《教育志》。
- 45 《閩粵贛武威廖氏族譜》轉引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第210頁。
- 46 《閩贛武威廖氏族譜》，同上。
- 47 同治《大埔縣志》卷一一《風俗》。

有關本研究部之出版：

1. 鄭赤琰，《香港崇正總會與客家學展》。

族群研究論叢主要探討有關中國各族群的歷史研究和發展方向。

有興趣的人士可向以下地點查詢：
香港屯門，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電話：(852) 2616 - 7697

傳真：(852) 2465 - 0977

定價：港幣20元 / 美金3元

作者簡介：

王東教授畢業於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獲博士學位。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副教授。王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區域文化史、華僑華人史及客家族群的歷史與文化。王教授的主要專書有：《中國史學精神》、《客家文化》、《胡文虎評傳》、《客家學導論》和《社會結構與客家人的教育》等。王教授亦有數十篇學術專論於大陸及台灣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王教授現在從事於傳統時期的客家社會結構及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文化人類學研究。